

20 世纪初的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

——以福兰阁的王安石研究为例

孙 健

〔摘 要〕 20 世纪初,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从汉学的一个分支进而奠定起独立的学科地位,19 世纪发展成熟的历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学为原本从属于汉学的中国史书写提供了标准进程,由历史问题引领、建立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基础上、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的新范式逐渐确立。福兰阁是 19、20 世纪之交新型学院式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将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搭建起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福兰阁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新范式的特点,通过对王安石等杰出人物的观察,他提炼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议题,并以演化的方式追踪其在历史时间秩序中的外在表现,发掘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 20 世纪初;福兰阁;历史主义史学;中国史研究;王安石;国家社会主义

20 世纪以前,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研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欧洲历史学致力于探索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进步”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史仅处于其世界史话语框架的边缘地带,19 世纪主流历史学家如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等,视中国历史为“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认为其只能归入人类学或“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的范畴,不能被纳入他们所讨论的世界史范围内^①。因此,尽管 19 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但不断完善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却没有被应用于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仍然从属于汉学分支,并将汉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作为工具。20 世纪初,欧洲中国史研究尝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介入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学方法的引入,使中国史研究也拥有了可以系统地被说明、理解和讨论的标准进程,从提出问题,到史料考证,最后达成对问题的解释^②。问题意识的增强,促使中国史书写模式由以事件叙述主导转变为以问题为导向;史料的批判性分析原则,引发人们反思此前中国史书写在文献基础方面的不足,人们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法鉴别史料和传统;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赋予人们新的视角。中国史研究告别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确立起新的研究范式,从记述事件发展到论述文明。

孙健,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89)。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 世纪欧洲中国史书写的范式及影响研究”(21YJA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加拿大]格利高里·布卢(Gregory Blue):《中国与西方世界史的书写》,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 3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0、31 页。

②范丁梁:《19 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学科塑形力》,《江海学刊》2018 年第 4 期。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与20世纪初欧洲中国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同时,欧洲学界的王安石变法研究也出现新进展,新一代学者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由早期传教士确立的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叙述,摒弃其中的宗教色彩和道德评判立场,王安石变法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明显共通性得到“再发现”^①。德国学者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新型学院式汉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柏林、哥廷根等欧洲大学接受系统的历史学、法学训练,又以外交官的身份久居中国,接触到优秀的中国学者和丰富的中文资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兰阁陆续发表多篇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著述,他的研究深受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影响,搭建起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②。本文拟剖析福兰阁王安石研究的模式及理论来源,揭示其对于观察20世纪初欧洲中国史研究范式转换过程的学术史意义。

一、历史问题的提出:王安石变法与国家社会主义

在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德国历史主义史学扮演了重要角色,兰克奠定了史学研究客观性、科学性的基础,德罗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更进一步完善了历史知识理论^③。福兰阁成长于历史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在他就读柏林大学期间,兰克和德罗伊森都任教于此,德罗伊森尤其给福兰阁留下了深刻印象^④,他的中国史研究中也带有深重的德罗伊森史学的烙印。

德罗伊森在方法论方面阐明了史学研究的标准进程:

先从我诸多的观感中,建立一个念头、一个观点或直觉,借着它来展开历史工作。我们寻找相关的材料,清理它;掌握住批判考证过的可信事实;然后以解释其中不同的因素的方式,来深入理解它。最后在理念的解释的工作中,找到该事实在整个理念交织及运行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历史意义。^⑤

德罗伊森指出,提出问题是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而所谓问题又主要在国家政治思想层面。作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国家”的概念和立场在德罗伊森的研究中被不断强化。他强调,历史解释要去揭示一个时代国家思想伦理的理念,而对国家伦理理念的研究又要通过观察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来实现,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领先的理念,通过将理念付诸实践而推动时代发展,研究他们对史家而言是“最吸引他们的任务”。^⑥

受德罗伊森的影响,福兰阁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同样偏重于国家政治思想方面:“我研究的一个国家所形成的中华文化的政治和思想发展史,已成为我学术研究的终身使命,因此我的几乎所有报告都与这个发展过程的各种现象有关。”^⑦20世纪初,西方学界盛行以社会主义理论观察王安石改革^⑧,福兰阁

①J. Meskill, *Wang Anshi, Practical Reformer?* Boston: D. C. Heath and Co., 1963, p. 35; 张呈忠:《近三百年来西方学者眼中的王安石》,《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②有关福兰阁汉学研究的讨论,参见李雪涛:《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2日,第B06版;黄怡容:《福兰阁的中国史观述论》,《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在近年的研究中,德罗伊森逐渐被视为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标志性人物或19世纪德国历史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代表,参见吕和应:《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纲要〉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

④[德]福兰阁:《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欧阳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⑤[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56页。

⑥[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47、48页。

⑦[德]福兰阁:《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第187页。并参见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第102、103页。

⑧19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率先注意到王安石变法与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共通性,这一发现启发了西方学者,至20世纪初形成以社会主义理论观察王安石改革的潮流[参见[法]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在大清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历险》(下),张子清、王雪飞、冯冬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Lewis A. Maverick, “Review Work: Wang An-shih, Chinese Statesman and Educationalist of the Sung Dynasty by H. R. Williams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1, 1941, pp. 80—84.]

解释道：“对西方社会政治进程的熟悉使人们重新审视王安石的改革，人们惊奇的发现，其中含有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来管理社会矛盾的现代思想。”^①福兰阁敏锐地意识到，借助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视角，通过对王安石改革思想的讨论，可以进一步透视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

福兰阁明确指出王安石改革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特质^②：“我人由其断片问题之研究，觉其政策略有近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商业贸易的价格统制”^③；“王安石是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些改革措施的，如财政体系、科举制度、军队、教育制度，以及役法等。”^④福兰阁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国家/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与管理，带有明显的普鲁士学派的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世纪德国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要求强有力的国家把全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一个强固的国家最大的需要，便是一个手握大权、勇于有为的政府，身处其中的政治家不为任何人民利益服务，他只知道国族意旨^⑤。福兰阁显然在王安石领导的改革运动中看到了类似因素，他将王安石经济改革的设想概括为两个方向：政府通过社会救助帮助经济贫困者；政府介入市场运作实现财政盈余^⑥，都是突显改革中“国家”的立场。

德罗伊森主张超越个别的特殊事件，在进步变化的脉络中掌握“理念”^⑦。从这一原则出发，福兰阁进一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搜寻“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轨迹，最终勾勒出从先秦管仲、李悝，两汉桑弘羊、耿寿昌、王莽，唐代刘晏到王安石的线索，其中又以汉、宋两代表现最突出^⑧。至此，福兰阁实践了德罗伊森关于提出历史问题的主张，通过王安石观察到一个时代的思想理念，进而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掌握它，“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也从而超越个别性，被提升为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属性的“中国国家主义”的一大特质^⑨。

二、史料批判与文献基础：道德评判立场的摒弃

20世纪以前，欧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早期耶稣会士的记述，其文献基础是宋明义理史学模式下的“纲目”“纲鉴”体史书^⑩。这类史书中蕴含着强烈的道德批判立场和浓郁的

①O. Franke, “Der Bericht Wang Ngan-schis von 1058 über Reform des Beamtentums. Ein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s Reformators”,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932,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32, p. 269.

②1909年，俄国学者伊凡诺夫在《王安石及其改革》一书中称王安石改革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这似乎是最早以“国家社会主义”来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尝试。1915年，马克斯·韦伯援引伊凡诺夫的说法，称王安石进行了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伊凡诺夫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德国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仍需进一步确认，韦伯也只是将王安石与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改革展开类比，至福兰阁才明确地将王安石变法与德国国内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尝试进行比较。

③[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食货》（半月刊）1936年第7期。

④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4, *Der konfuzianische Staat II: Krisen und Fremdverhältnisse*,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48, p. 168.

⑤[德]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3、245页。

⑥O. Franke, “Der Bericht Wang Ngan-schis von 1058 über Reform des Beamtentums. Ein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s Reformators”, p. 266.

⑦[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51页。

⑧[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⑨[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⑩作为18世纪欧洲汉学的代表性著作，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宋代君主史纲”参考了袁黄的《历史大方纲鉴补》，冯秉正《中国通史》宋代部分转译自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纲目”“纲鉴”体史书在早期传教士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见[比]钟鸣旦：《耶稣会士的中国史与纪年著作及其所参考的中国文献》，见耿幼壮、杨慧林主编：《世界汉学》（第1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法]蓝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82页。

说教意识^①,承袭元祐党人的看法,将王安石描述为阴险奸诈的亡国罪人。耶稣会士视之为忠实无误的“信史”(histoire authentique)而接受不疑^②,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饱含宗教色彩和中国传统史观的叙述模式,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在这种研究范式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文献中元祐诸臣的说法已经代表了无可质疑的事实,王安石留下的史料则被有意忽视、曲解或“批判性”放弃。

随着历史主义史学的理论被应用于中国史研究,这一学术传统受到挑战。历史主义史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史料考证原则和方法,当人们将之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时,便自然导向对17、18世纪以来耶稣会士中国史叙述的否定。福兰阁表现出鲜明的史料批判意识,对欧洲此前中国史书写的文献基础予以严厉批评:迄今为止,西方一切关于中国通史的叙述,都无一例外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依赖着《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这两部宋代史书及其续篇,但两者的可靠性及其史料价值却没有被认真考察过,其记载也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鉴于这些史书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理应以当下的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其史料价值予以更准确的评判。^③

兰克反对历史学家作超越事实的价值判断,德罗伊森也强调文献考证工作应指出文献中因时代、地域或作者本人的教育、个性、倾向而生的偏见^④。这种原则针锋相对地站在宋明义理史学的对立面,启发了福兰阁的思考。福兰阁批评司马光和朱熹撰史时过于强调道德立场,《资治通鉴》中尽管某些部分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有可指摘之处;《通鉴纲目》则纯粹是儒家应用伦理的教科书,绝非客观史料。^⑤

对司马光、朱熹的批判,连带否定了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袁黄《历史大方纲鉴补》等早期耶稣会士用来认识王安石的史料基础,福兰阁努力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客观的文献基础上,他对自己的文献资料进行说明:

近来关于此伟大政治家之研究,尚无完满精确之著作出现。在中国文献中,则以《宋史》之《食货志》,《宋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七章之《王安石变法》,与《文献通考》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中可以给与我们比较明确之概念,又《续资治通鉴》(十八世纪末)第六十六章至第七十八章,关于王安石之行为及其反对派之攻击皆有详细之记载。^⑥

这些文本自然也贯穿着史家的个人意志,但福兰阁着重在其中发掘“明显事实记载”^⑦,即有关改革制度、政令、实施细则等内容的客观记述,以尽可能消除文献中的主观倾向性。如,他根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元丰年间诸路常平散敛数额^⑧计算指出,青苗钱给宋朝政府带来的收入逐年下降,最初平均每年可得利息20%,至元丰三年只有10%,元丰四年甚至损失资本百八十万以上,这是它难

①参见罗炳良:《从宋代义理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罗炳良:《“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罗炳良:《南宋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3—361页;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0—292页;等等。

②冯秉正在其《中国通史》中声称,在所有世俗历史中,中国编年史的准确性和延续性使它们足以依赖,通过对《资治通鉴纲目》的翻译,他完全实现了向欧洲知识界提供中国“信史”的目标(参见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Premier, Préface, Paris, 1777, pp. 1—li.)。

③O. Franke, “Das Tsé tsi tung kien und das Tung kien kang-mu, ihr Wesen, ihr Verh? ltnis zueinander und ihr Quellenwert”,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930,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30, p. 103.

④[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26、27页。

⑤O. Franke, “Das Tsé tsi tung kien und das Tung kien kang-mu, ihr Wesen, ihr Verh? ltnis zueinander und ihr Quellenwert”, p. 141.

⑥[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⑦[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87页:“准诏诸路常平,可酌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穀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引文见[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以持久的原因之一^①。无论这一意见在今天看来是否合理,但其分析方式无疑超越了此前耶稣会士单纯基于道德立场的指责,昭示出新、旧两种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分野。

福兰阁使用的另一类史料是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文集,这是对历史主义学派重视当事人留下的一手资料的原则^②的呼应。福兰阁将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视为了解王安石变法思想、探究新法本质的关键文本:“对其改良事业之研究,亦当从此着手”^③。他表达了对此前学界忽视这一文本的不解和批评:《万言书》被认为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却在后来被人们完全遗忘了。中国人遗忘的原因较易解释,但令人奇怪的是,很多曾经研究王安石政治效力的西方学者,也没有任何人使用甚至稍微提及这篇基本文献。^④ 1932年,福兰阁在普鲁士国家科学院发表研究报告,将《万言书》译成德文,并使用了四种版本校订^⑤。福兰阁为译文撰写了详细的导言,阐述《万言书》的时代背景和王安石的改革思想,王安石留下的资料及其改革设想在欧洲汉学史上第一次受到充分的重视。

福兰阁对王安石直接对手留下的资料同样看重,“王氏之反对者苏轼、韩琦等之笔记语录中,皆有足资参考”^⑥。他注意到这些文集中均包含着对新法的各种批评,“彼辈对于‘青苗贷金’制度与国民官僚之道德,皆暗示着重重大之弊害”^⑦。但在经过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指导后,福兰阁没有再像此前的耶稣会士那样轻信这些批评,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作者的主观性对文献价值的削弱,指出仅凭这些论述不足以做出对王安石变法的客观评价:“王安石之社会政策活动,我人欲下一正确之评语,实非容易,因由彼之新颖的思想,与自尊心所引起之儒家士君子阶级的非难与郁愤的描写,或故意放大其词,实未可知。”^⑧取而代之的是,福兰阁尝试借助文献中的客观记载,并结合其他同时人的描述,检查这些批评的真实程度。

历史主义史学确立起科学的史料鉴定原则,指引福兰阁摒弃了此前叙述中充满道德说教意味的文献资料,福兰阁一方面努力从《宋史》《文献通考》等史料中发掘出对当时情况的“明显事实记载”,对改革成效予以客观的观察和评价;另一方面对事件当事人留下的一手资料展开审慎的鉴别,力争使进一步的解释工作建立在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三、历史解释:思想与现象间相互促进的理解

兰克史学建立在考订史实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历史考证所得的过去事实本身,便足以使人洞见历史发展的脉络。德罗伊森批评说,由史料考证所得的只是史料中所见的事实,而不是这些事实构成的历史脉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理解或解释。历史解释要据内在思想发展过程,说明外在时间秩序中的各种现象^⑨,实现思想与现象间相互促进的理解^⑩。

①[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②李孝迁、胡昌智著:《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5页。

③[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④O. Franke, “Der Bericht Wang Ngan-schis von 1058 über Reform des Beamtentums. Ein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s Reformators”, p. 269.

⑤四种文献分别是《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褚东郊编注的《学生国学丛书》,三岛中洲和沈德潜出版的日本汉文大系中的《唐宋八家文读本》,以及梁启超《王荆公传》中的附录引文,参见O. Franke, “Der Bericht Wang Ngan-schis von 1058 über Reform des Beamtentums. Ein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s Reformators”, p. 276.

⑥[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⑦[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⑧[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⑨[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引论”,第19、20页。

⑩[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57页。

遵循德罗伊森指出的路径,福兰阁梳理了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种种表现。福兰阁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独占与管理,它并非从王安石时代才开始出现,《周礼》中已经有关于“文化及经济生活领域内之市场统制”^①的详细规划,先秦、两汉、唐代各自都有国家独占经济思想和付诸施行的措施。王安石的新经济政策亦系由前代和该时代尚存的制度结合而成:“其所施行之方法,为纪元前110年桑弘羊所创之租税运输均输官,与价格统制官,及耿寿昌之常平仓。至其第一第三两项之组织,则取法八世纪后半刘晏之盐与穀物的管理法。”^②至于青苗法,“亦非彼之独创,而不过引用王莽之独占经济的剩余,以实行信用贷借与人民,以榨取二三分之利率而已。”^③由此,福兰阁勾勒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脉络,揭示出王安石思想的渊源。

福兰阁概括出王安石改革设想的两个方向:政府通过社会救助帮助经济贫困者;政府介入市场运作以实现改革目标^④。前一个方向上,常平仓兼具“价格统制”和慈善性质,这一制度完全为预防农民无产者之穷乏而创设,后因政府财政困难及对外战争的影响,不得不以之移充军粮。继而又因军民之粮俱不充足,只能“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由政府贷金于民以资耕作,俟穀物成熟后加以利息还诸政府,这种贷金便是“青苗钱”。福兰阁称之为穀物耕作的“国家保护统制”,是一种“国家信用贷借”,“由农民之质权者以榨取利润的大胆之企图”。^⑤

政府介入市场运作则表现为均输法。在讨论均输法的背景时,福兰阁引述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由于供需信息沟通不畅,中央和地方财政都蒙受巨大损失,只有“富商大贾”居中渔利。均输法的实施,使代表政府的六路发运使取代“富商大贾”的角色,秉持“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将原本归于富商的财富收归政府,“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⑥均输法的本质,实际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环节来实现财政盈余。

以演化的方式把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目的是达到对事物真正的理解^⑦。在梳理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脉络后,福兰阁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他指出,作为“中国国家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基础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古代中国的经济活动概由君主决定,“民众之物质生活基础由此确立,国家之法则亦基以成立”。^⑧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中国历史上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之经济统制企图”,出发点大多是为国君扩充府库,为国家物质利益计算,而非救济农民之贫乏。这种理论不外乎移富济贫,通过平准天下货价和排斥私人投机,使国计民生臻于安定,而在执行过程中又弊端百出,对国家商业活动信用的维系和对官员腐败的防范都未受到重视,因此“结果皆无成绩可言”。^⑨

德罗伊森认为,史家研究的对象是在探明过去先行发生的现今社会的特质,历史知识所要达

①[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②[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③[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④O. Franke, “Der Bericht Wang Ngan-schis von 1058 über Reform des Beamtentums. Ein Beitrag zur Beurteilung des Reformators”, p. 266.

⑤[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⑥《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第4556页。引文见[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⑦[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29—32页。

⑧[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⑨[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成的,不只说明过去本身曾经如何,更要以深刻的时间面向说明现今社会^①。福兰阁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对他来说,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不仅意味着文化传承,更重要的是去认识“当代”中国^②。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考察,福兰阁归纳出中国国家理论的一个特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反对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因此统治者对人民私有土地物产的商业贸易不但不加以保护,甚至予以取缔,这导致商业的衰落,所存者只有农业而已^③。这种作法违背了人们追求私有欲的自然之理,不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将使国家蒙受莫大损失^④。福兰阁指出,这一矛盾在“当代”中国仍然影响深远,由于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私人商业资本只能依靠个人能力向外发展,它导致政府与民众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民国时期民众对政府高层的动向往往漠不关心,根源正在于此^⑤。

四、结 语

欧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在20世纪初经历着重大转变,19世纪发展成熟的历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学为原本从属于汉学的中国史书写提供了标准进程,由历史问题引领、建立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基础上、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的新范式逐渐确立起来。学界已经注意到20世纪初欧洲中国史研究、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学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留学欧洲的中国学者是将近代欧洲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先行者,他们的研究又反过来启发了欧洲学界^⑥。

福兰阁的研究则在这一线索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成长于欧洲学术环境的西方研究者有意识地将受到的学术训练直接应用于汉学研究。福兰阁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完全来自于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他直接受教于历史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德罗伊森,自觉地将德罗伊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移植于中国史研究,在研究中精确地呈现出历史主义史学的展开进程。他努力践行着历史主义史学倡导的史料批判原则,力争在史料中分离出对于事实的客观描述,使研究建立在已经考证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福兰阁严格遵循着德罗伊森对历史解释的规定:据内在思想的发展过程,说明外在时间秩序的各种现象。他提炼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以演化的方式追踪这一思想在历史时间秩序中的外在表现,达到思想与现象间相互促进的理解。福兰阁并不局限于对“历史中国”的叙述,而是尝试建立起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发掘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在今天看来,福兰阁的看法和观点固然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一个学术史的样本而言却弥足珍贵,它展现出史学理论和方法介入作为汉学分支的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过程,昭示出20世纪初欧洲中国史研究得以确立起独立学科地位的动力和方向。

(责任编辑:张 升)

①[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导论”,第15、16页。

②参见李雪涛:《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

③[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④[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⑤[德]福兰阁撰,苏乾英译:《中国上古及中古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⑥[法]巴斯蒂撰,胡志宏译:《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国际汉学》2003年。

European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Early 20th Century: Exemplified by Otto Franke's Research on Wang An'shi

SUN Jian

Abstract: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Europe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maturation of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historical theor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i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which placed emphasis on addressing historical questions, employing rigorous textual criticism, and utilizing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as analytical tools. Otto Franke, who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sinologist in early 20th century, introduced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European Historicism into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His research on Wang An'shi clearly showed the features of this new research paradigm. He proposed a theory that the state socialism ideology had once appeared in Chinese history. By means of the observa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such as Wang An'shi, he traced the outward manifestations of the ideolog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explicated its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early 20th century; Otto Franke; historicism;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Wang An'shi; state socialism

About the author: SUN Jian, PhD in History, is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